

# 海外华文教育的奇葩： 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办学方针研究

祝家丰<sup>1</sup> 王晓梅<sup>2</sup>

(1.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 马来西亚 吉隆坡 50603; 2.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 雪兰莪 雪邦 43900)

[摘要] 马来西亚华人虽面对国家机关实施之单元教育政策的深钜影响,但却能发展出一支独特且蕴含着韧力非凡的华文教育体系。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系可谓是在中、港、台以外发展得最完善和肩负着薪传中华文化重任的体系。马来西亚的华文独立中学(独中)由于注重素质教育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因此得到华裔家长的支持。但21世纪全球化所带来的英语教育至上思潮冲击了马来西亚的独中。为了应此挑战,独中努力推广三语教学。

[关键词] 马来西亚华人; 华文教育; 独中; 素质教育; 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 G53.3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16)03-0057-07

## The Ideal Chinese Edu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

## A Study on the Model of Education of Malaysian Independence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Thock Ker Pong Wang Xiaom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 University of Malaya , Kuala Lumpur ;

Department of Chinese , Xiamen University , Malaysia Campus , Selangor Sepang)

**Abstract :** Malaysia's Chinese education is spectacular in its development albeit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monolingual policy from the state. It offers the best Chinese education outside China and shoulders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Malaysia.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ICSS)in Malaysia which emphasize on quality educ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garner the staunch supports of many Chinese parents.

**Key Words :** Malaysia ; Malaysian Chinese ; Chinese education ; Independen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马来西亚独立至今(2016年)已是五十九年了,但其依然面对国族构建之困扰。在教育领域,有鉴于政府实施单元的国民教育政策以形塑由马来族为主导的国族,所以华文教育面对一系列国家教育政策与法令的冲击。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长

期面对各种不利其发展的束缚,但得到华人社群的鼎力支持与抗争,并且衍生为令人敬佩的华教运动。马来西亚华人这股捍卫华文教育的精神,主要是源自他们把华校与华文教育视为是传承中华文化和语言及赓续华人族裔认同的最重要载体。

[收稿日期] 2016-08-16 ; [修回日期] 2016-07-15

[作者简介] 祝家丰(1960-)男,海南文昌人,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研究方向:马来西亚华人政治与教育、东南亚华人; 王晓梅(1974-)女,山东泰安人,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马来西亚华语。

马来西亚华人虽面对国家机关实施之单元教育政策的深钜影响,但却能发展出一支独特且蕴含着韧力非凡的华文教育体系。此现象实属罕见。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系可谓是在中、港、台以外发展得最完善和肩负着薪传中华文化重任的体系。由于马来西亚已有小学、中学至大专院校的华文教育体系,中华文化一直能在华人社群体里赓续与发展。马来西亚华人不忘根本,赚取温饱之余,不忘华文教育。在他们当中流传了这么一句话:“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他们在没有得到政府的资助下,出钱出力,艰苦兴办华文教育(华教),传承华教的精神深叫人感动。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若从1819年在檳城建立第一间私塾五福书院算起,已有197年的历史。其悠久的历史说明了华校与华文教育一直以来都受到华人社群的重视。

## 一、华文独立中学(独中)的诞生与发展:从挣扎求存到复兴

马来亚第一所现代化华校是1904年在檳城设立的中华学校。那一年,当各地旧式学塾教育还普遍流行之际,在富商张弼士的领导及一批侨领的策划下,檳城的华社即创办了此所学校,为马来亚于南洋地区华文教育掀起新的一章<sup>[1]</sup>。随着檳城中华学校的开办,马来亚各地华人竞相仿效,纷纷成立新式华文学校。旧有的私塾也一间接着一间地改为新式学堂,因此兴起了华社的全民办学的热潮。作为新马华人聚居的重镇,檳城华校如雨后春笋般的设立可说成为这区域的楷模。英殖民政府在1920年以前对马来亚华校基本上是采取放任的态度,也不加以管制并让华校自由发展。但随着《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的颁布,英政府显然对华校的蓬勃发展存有戒心。此项法令表面上虽谓

用来管制所有学校,实际上乃蓄意以它控制和监管华校。殖民政府强行实施此项法令的原因是因为当时马来亚的华校深受中国政治思想,特别是具有鲜明反殖与民主意识的“五四运动”之影响,这是英殖民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因此这法令的背后目的是要阻止各种政治思潮影响华校和阻止师生参加政治活动,以免危害英殖民政府的利益。虽然殖民政府在1924年开始津贴华校,数额却微不足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还继续给予符合补助条例的华校津贴,但英政府所给予的津贴是要达到控制华校的目的。二战后当英殖民政府重新掌政马来亚,其教育政策亦开始有了变化,即于1946年和1950年发布了两份教育改革报告书<sup>①</sup>。由于社会里各族群的反对浪潮持续,英殖民政府所提出的两份教育报告书并不能付诸实践。过后当局于1950年7月25日委任巴恩教育委员会以检讨当时的马来源流学校与其制度。该委员会在1951年6月提出了那份对华文教育影响深远的报告书——巴恩报告书。此份报告书首次在马来西亚教育史上提出了“国民学校”的概念。委员会的成员们把国民学校定位为“国族建构之校”(Nation-building school)与“公民之校”(Schools for Citizenship)<sup>[2]</sup>。为了促成单一源流的国民学校,巴恩报告书更否定了华文与淡米尔文学校的存在价值。巴恩报告书的重要性是在它所推介的国民学校概念。独立后马来西亚的数份教育报告书都一直沿用此概念。例如对马来西亚教育政策影响深钜的《1956年拉萨报告书》之“最终目标”就阐明教育部必须把各族群的孩子,集中在一个以国语(即马来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家教育体系<sup>②</sup>。这正是国民学校概念的体现,它将是达致国家教育政策“最终目标”的最有效工具。其后的《1960年拉曼达

①首先,由马来亚的教育总监于1946年提出的兹斯曼(Cheeseman)报告书建议政府须公平对待各源流的学校并提供它们6年免费的小学教育。由于巫统反对此报告书及马来亚联合邦的成立,殖民政府于1948年的九月设立一个中央咨询委员会来检讨当时的教育政策。此委员会(Central Advisory Committee)是由当时的教育总监,候革尔(M.R. Holgate)出任主席。这委员会正式首次提出单一源流学校的概念以团结和整合马来亚国民。于1950年发表的首份候革尔报告书亦阐明马来亚最理想的教育源流是英文学校。在这单一源流的制度下,所有的马来亚学童须接受单一的授课媒介语——英语,“最终目标”(Ultimate Objective)的字眼也首次在该报告书出现。它亦建议在过渡期间政府应只允准英文与马来文小学,参阅Tan Liok E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M].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48-49.

②“最终目标”的字眼自1950年出现在候革尔报告书后就一直被马来西亚政府在其各种教育报告书与计划中引用。该国的华教人士担心政府会通过各种教育政策和计划来改变华文小学(华小)的教学媒介语以达到“最终目标”,所以这词汇一直是华教人士的梦魇。有关“最终目标”的应用与其对华文教育的影响,可参阅陈松生. 五十年不变——简述“最终目标”[A]. 董总50年特刊(1954-2004)[M]. 马来西亚加影:董总, 2004: 1249-1251.

立报告书》为了强化所有学校使用马来语作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更建议：“为了达致国民团结……，要消灭种族性中学（指华文中学）……，同时，要确保各种族的学生进入国民中学和国民型中学就读”<sup>[3]</sup>。

马来亚是在族群协商和团结精神下得到了独立，但其华文教育发展并不因此进入坦途。马来亚独立后的《1957年教育法令》虽正式接纳华文小学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一环，华文中学却在四年后面对严峻的考验。当时联盟政府颁布的《1961年教育法令》在1962年1月1日开始实施。在此法令下政府停止向华文中学提供部分津贴，只提供全面津贴给那些愿意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拒绝接受改制的学校便被排除在国家教育体制之外，成为华文独立中学（独中）；至于那些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则成为马来西亚独有的国民型中学<sup>①</sup>。实际上政府在1960年8月3日发表达立（Rahman Talib）教育报告书后，多方呼吁全国华文中学接受报告书的建议，申请改制为国民型中学。这项呼吁很快地就获得槟城华文中学的响应，影响所及，吉打、霹雳、雪兰莪的华校，亦纷纷接受改制。

但在马来半岛的南端，即柔佛州的新山，其华文中学就有另一番发展趋势。当钟灵中学改制事件造成华社焦虑不安，华文中学面临失守的危机时，宽柔中学董事部毅然于1957年12月18日开会决议拒绝改制并对外宣布从1958年元月1日起，宽中不再接受政府分文津贴，全部校务经费由董事部自筹及承担，实现自力更生的范式并成为马来亚第一间独中。拒绝改制，宽柔中学董事部的此项议决，在马来西亚华教发展史上意义深远，在华文中学改制问题上扮演着极具关键的带头作用。当时其坚毅地留在华教的阵营可说是激发和增强了其他华文中学“独立”的决心<sup>[4]</sup>。宽柔中学的

果敢行动启示了芙蓉的中华中学，成为第二间拒绝改制的华文中学。因此宽柔中学可说独中的先行者，它力抗华文中学改制的狂澜，为当时处于劣势的独中留下香火<sup>②</sup>。

在改制大浪潮下，60年代的独中顿时陷入困境。由于当时华裔家长的经济条件不那么好，他们的子女没有能力入读需要缴纳学费的独中，一般他们都选择国民型中学或国民中学。这造成独中的学生剧减，因此学校也缺乏经费。为了生存，许多独中大量招收政府考试的落第生，沦为补习班。独中的校誉也每况愈下，各地的独中都在凄风苦雨中挣扎求存。到了70年代，由霹雳州一批爱护华教人士所发起的复兴运动扭转了独中的困境<sup>③</sup>。就在霹雳州独中复兴运动办得有声有色而且达到示范性作用的时候，1973年12月6日，董教总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大会，“全国发展华文独中运动大会”，成功把独中复兴运动推向该国各个角落，为各地的独中注入新生机。是次大会接纳了董教总所提出的《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该建议书可说是马来西亚华教发展史一份重要文献。它标志着独中的一个新的转折点，扬弃了追随国民型中学的尾巴路线，厘清了华文中学应该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而不是中英并行的双语路线，确立了华文中学应是华小教育的延续，而且是一贯的母语教育系统<sup>[5]</sup>。当董教总主办的第一届独中统一考试（统考）在1975年12月11日至17日分别在东、西马42个考场同时举行时，华文教育由小学至高中的教育系统，基本上就已完全恢复了。随着统考的成功举行及董教总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统考的文凭备受国内外承认<sup>④</sup>，独中水准越办越高，学生越来越多，设备也越来越齐全，它已成为马来西亚国内优良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了。

①马来西亚现有79所国民型中学。虽然这类学校仍然保有华校的作风，但由于其教学媒介语已改变为马来文，因此其和独中是迥然不同的学校。

②当时不接受改制的中学兵败如山倒，70所华文中学，只有16所坚持独立，其余54所接受改制。马来西亚华社也因此断送了54间华文中学。相关详情参阅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独中今昔[M]。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85：31。

③1973年4月1日霹雳州一批爱护华教人士在华裔企业家胡万铎呼吁和领导下发动了在该州的独中复兴运动。当时由他领导的霹雳独中复兴工委发动筹款马币一百万令吉以支援州内九所独中，该项行动举获得该州的华裔企业家、小贩和老百姓的积极响应。该运动过后席卷马来西亚各地的独中，成功给独中带来生机。相关详情可参阅王瑞国。马来西亚华文中学的改制与复兴：以霹雳州为例（1962—1985）[M]。怡保：王瑞国，2014和甄供。播下春风万里：霹雳州华文独中复兴运动纪实[M]。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96。

④虽然统考文凭受到许多中港台和西方大学的承认，但马来西亚政府至今依然拒绝承认统考文凭。

## 二、独中的现今发展概况：稳健成长

随着独中复兴运动的成功和统考品牌的创建,马来西亚独中的总人数在1973年后逐年稳健地攀升。在1994年,其人数达到了顶峰,过后独中学生总人数开始逐年下滑(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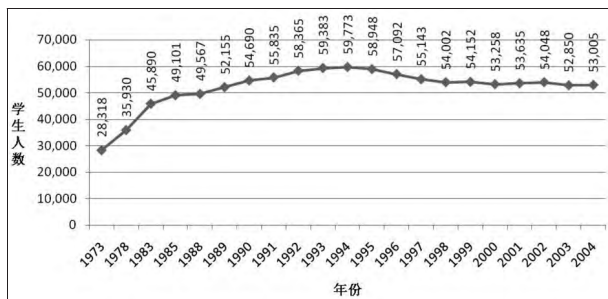


图1 马来西亚华文独中学生人数(1973—2004)【教改前】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自董总(2014:1308)

但在董教总于2005年正式推展独中教育改革(教改)行动后,独中才能有今天欣欣向荣的格局。在过去的10年(2005—2014),马来西亚61间独中学生人数取得高达48%的显著成长。2005年的独中学生人数为53,402人,而2014年则达到79,264人,增加了25,862人(《东方日报》2014-10-05 A4)。在这10年里总共有7个州属的独中学生增幅超过50%以上,包括雪兰莪(93%)、霹雳(78%)、檳城(73%)、森美兰(73%)、吉打(68%)、砂拉越(78%)和吉隆坡(51%)。到了2015年,全国独中学生总人数冲破8万人,创历史新高达83,042人。图2详列独中学生总人数2005年过后11年来的增长趋势:

自独中推展素质教育和注重三语教学后,华裔家长竞相把子女送进独中升学。但城市地区独中的学生名额有限<sup>①</sup>,这造成许多华裔学生望门兴叹。例如在2014年就有5,502名新山华小毕业生须要通过入学试以争取进入只能提供1,550名额的宽柔中学校本部和古来分校(《东方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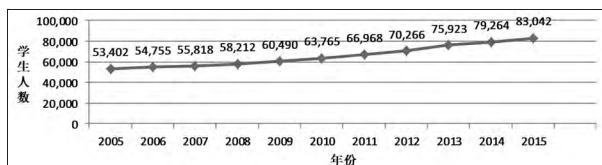


图2 马来西亚华文独中学生人数(2005—2015)【教改后】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自董总(2014:1308)《东方日报》,2015-02-06 A4.

2014-12-09 A28)。

## 三、面向国际的人才培养 独中的素质教育

马来西亚的独中经历了没落、复兴、成长和展翅高飞的颠簸路程。这历程彰显了马来西亚华人强韧兴办民族教育的决心和积极投入建设华文教育的付出。从华人民间力量的动员和参与、董教总的领导,到华社精英的献策与规划,这景象一一显现了马来西亚华社团结一致地要办好华人文化和教育的堡垒。有了这些人的参与,独中教育才有今天展翅高飞的发展景象。独中能有今天欣欣向荣的格局可说是归功于董教总所推动的独中教育改革(教改)行动。1994年马来西亚全国独中学生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其人数在1994年之后就开始下滑,独中也面对全球化下英文教育至上的挑战,这时候独中办学者开始思考提高独中教育素质的问题。其实独中的教育改革是承先启后的工程,并非始于近几年。独中一路走来都因应时代变迁和教育发展趋势,不断地进行教育改革,并在延续过去独中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办学的素质和内涵。

为了更有效地发展和规划马来西亚的独中,1996年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在1996年明确指出独中应踏上教改之路,全面开展“素质教育”的路线图<sup>②</sup>。该工委经过数年的意见收集、研讨、教育考察等活动,于2003年7月发表了《独中教育改革纲领(草案)》,但其教改完整纲领是在

<sup>①</sup>这是因为马来西亚政府限制独中的增建,独中在1962年教育法令落实后,只剩下60所。时至今日,政府只允准一所新独中的设立,即位于新山的宽柔中学二校。该校是在1999年大选前因执政党战情吃紧而批给新山华社的礼物(政治糖果),该校于2005年正式开办。

<sup>②</sup>此建议是由在1996年6月13日至15日沙巴举行的“全国独中校长研讨会”所达成的结论,参阅陆庭谕.回顾与展望:《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落实25周年[A].2007年华文独中董事交流会资料汇编[M].马来西亚加影:董总,2008:130.

2005年1月9日正式发布<sup>①</sup>。过去,独中办学者群策群力,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独中教育体制,以回应及落实《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中“为什么办独中”和“办怎样的独中”这两大议题。但《独中教育改革纲领》要实现的是“独中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如何培养出这些人才”的议题<sup>②</sup>。在“培养人才”的议题上,独中将根据成人成才的教育目标,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教改纲领认为学生是教育主体,应让全体学生透过母语学习,获得全面发展,汲取信息科技与文化,奠定终身学习的基础和条件以成为新时代的主人<sup>③</sup>。教改纲领认为独中应朝“素质教育”的方向办学以加强家长对独中的信心,把孩子送到独中就学。独中必须以体现本身的办学素质和成果,作为吸引学生就读独中的根本原因。此外,教改纲领建议各别独中须发展其学校特色。虽然部分独中的办学条件也因所处地理位置而受到限制,但是相对于国民学校而言,独中的办学自主性强,各校除了遵循《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所提的办学使命与方针外,有极大的空间可以发展自己的特色。例如,槟城的钟灵独中除了在2001年开始实施独中办学路线,它自2009年所引进的《弟子规》教育已成功树立了口碑<sup>④</sup>。

从《独中教育改革纲领》发布至今,马来西亚独中的发展可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其飞跃式的成长说明了其素质教育的办学路线是正确的,它成功吸引了许多华裔家长竞相把子女送入独中就读。由于独中的口碑越来越好,除了友族学生也入读独中,国际学生也到来报读。譬如槟城韩江独中近年来就迎来印尼、韩国与日本等国家的学生<sup>⑤</sup>。槟城的另一所独中,钟灵独中已有20多名泰国学生入读<sup>⑥</sup>。在《独中教育改革纲领》领航下,各地独中都纷纷实施素质教育,其学生人数也大

量增加<sup>⑦</sup>。独中的学生不只在学术上有优异的表现,在课外活动上,学生都能以自己的兴趣选择参加各种活动,他们的才华也得到充分发挥。在独中成人成才的教育理念下,独中的学生得到全面发展,成为面向国际的毕业生。

在提倡素质教育和统考文凭受多国大专院校承认下,独中毕业生都能顺利在马来西亚或国外大学继续深造。根据董教总的调查,近年来独中毕业生的升学率颇高,达75至80%。例如2007年有高达80%(国内55%,国外25%)的毕业生继续深造(《星洲日报》2010-01-03, A12)。到了2011年,其毕业生的升学率微跌至74.42%,但其到外国升学的毕业生则猛升至41%(《东方日报》2014-12-14, A13)。独中毕业生到海外升学的比率从2007年的25%剧增至2011年的41%,这数据说明了独中教育已成功培养出面向国际的毕业生。董教总的调查数据也显示,独中毕业生的升学目的地已不再局限于台湾和中国大陆,他们开始到西方国家如澳洲、英国等国家深造(表1)。

表1 2011年全国独中毕业生国外升学分布人数及百分比

国家/地区	人数	占升学人数(4851人)%	占国外升学人数(2007人)%
台湾	1 225	25.44	61.04
新加坡	388	8.06	19.33
澳洲	112	2.33	5.58
中国	86	1.79	4.29
英国	59	1.23	2.94
爱尔兰	32	0.66	1.59
香港	29	0.60	1.44
日本	21	0.44	1.05
美国	18	0.37	0.90
纽西兰	10	0.21	0.50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自《东方日报》2014-12-14, A13。

①关于《独中教育改革纲领》的详文,可参阅董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60年会庆特刊(1954-2014)[M].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2014:779-790.

②根据该校校长——吴维城指出弟子规教育已有效地提升钟灵独中的学生纪律并成功塑造一个充满礼仪和爱心的学习环境。该校也因此成为马来西亚各地的华文小学、独中和国民型中学学习的对象(2013年8月27日于钟灵独中访谈吴维城校长)。

③2013年8月26日于韩江中学访谈江美俐校长。

④2013年8月27日于钟灵独中访谈吴维城校长。

⑤2013年8月28日于日新独中访谈其校长陈奇杰先生。陈校长认为除了素质教育外,“独中的师生关系密切”“校园文化非常好”“老师有献身精神”亦是促成其学生猛增的因素。

## 四、三语人才的培养 独中的语言教学特色

马来西亚独中虽然自 1961 年教育法令实施后就选择自力更生而遭摒弃在国民教育体系外,但由于是多元民族国家而其毕业生须在多语环境下谋生,因此独中的教学语言政策不能只专注于母语教学。在此国情下,独中一般上都采用双语或三语教学以让其毕业生在职场上更有竞争力。独中的教学语言政策虽然有争议<sup>①</sup>,但近年来独中一直受华人支持和肯定,这说明其办学方向是正确的。马来西亚全国 61 所独中的教学语言模式之考量,不外是如何在“一个传统、两大考试、三种语文”之间取得平衡,而各校对此各有理解<sup>②</sup>。独中所实践的“一个传统”,是指华校对马来西亚华社来说不仅仅是华文教育,还是追求平等权利和抗拒同化的象征,华校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所以教学语安排的底线,要避免损及独中的文化特征。所谓“两大考试”之间的顾虑,则是统考与政府考试孰轻孰重?还是两者并重?至于“三种语文”之轻重取舍,更是独中不得不面对的宿命<sup>③</sup>。虽然董教总贵为华社的“民间教育部”,但其对独中各校的办学方针和路线并没有约束力。各校独中的校长和董事部是决定独中办学方向的决策人。另外马来亚独中的办学模式亦受所处之区域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在此状况下,独中的办学路线和教学语言政策可谓五花八门,有各种模式。无论如何,各别独中的办学模式是否能持久与成功,这就取决于当地家长的认同和支持。

从历史的脉络来看,马来西亚的华裔家长对子女的语言教育是务实的,这可从早期槟城钟灵中学的教学语政策看出来<sup>④</sup>。从钟灵中学路线到现今剑桥英文在许多独中的教学里落实,不难发现马来西亚的华裔家长把子女送进独中除了是为注

重民族教育以传承中华文化,他们更希冀其子女能掌握好国际语言的英文。例如槟城的两所重要独中,即韩江和日新独中都推行多语教育,既有民族语言华语,又有国际语言英语,而且还有国家语言马来语,此种教学语取向满足了槟城华人在语言学习方面的需求<sup>⑤</sup>。这些学校大都推行三语教学的语言政策,即注重华文,强调英文,鼓励马来文。有的独中聘请以华语和英语为母语的外国老师执教,以改善学生的语言学习效果。韩江中学校长认为英语不但是国际语言,它还是主导整个世界的语言。它更应该被看作是人们的生存能力,掌握英语能使学生们的生活多姿多彩、增广他们的人际关系,进而增加学生们各方面的机会<sup>⑥</sup>。

不论是钟灵或日新的教师都一致认同英语的重要性。英语是国际语言,所以学生掌握了它将使学生们多一份优势;即使是马来文科主任也觉得英语不但是国际语言,也是科技语言。而英语主任觉得学生们如果掌握了这门语言,以后他们在私人界的会议上或提呈的时候都会用上它。一般老师们都认同英语为国际语言的地位。该语言是华族在外的主要沟通工具,日新独中英语科主任还认为掌握了英语可以有一语走天涯的优势<sup>⑦</sup>。此外,这两校的学生认为英语除了是国际语言外,也是他们在马来西亚日常生活中的沟通工具,还被一些同学看作是“杀手锏”,如果掌握了英语,那么以后他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了<sup>⑧</sup>。回到沟通的用途上,英语除了口语沟通时用得着外,在与银行的书信往来方面,它也是主要的媒介语。从独中生前途的角度来看,英语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因为英语的掌握程度将会左右以后他们前往深造国家的选择。一些有意要去欧美国家深造的毕业生如果英语掌握程度不够强,就只能选择中港台的大专院校。

马来语是马来西亚的国语,是国家的象征。华

①独中“以华语为主要教学语”究竟该推进到什么程度,迄今其办学者并无共识。各校在教学语的实践上,多年来从未一致,模式各异,争议不断。有关独中教学语政策的争议,可参阅王国璋,《反思独中的教学语政策:本土模式、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模式的比较》[A],《挑战与革新:2014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讨会论文集》[C],吉隆坡:林连玉基金,2015:146~153。

②有鉴于钟灵中学在改制前就已特别重视英文科,例如1954年其高中部除了华文一科外,其他数理化及史地商等全是英文课本,并以英语教学,其学生参加政府公开考试成绩斐然,因此成为其他华文中学校仿效的对象。另一方面,在面对一个多元语言、文化及民族的环境里,槟城人希望在英校及华校之间开辟出第三种学校,即钟灵路线,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三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1:397。

③2013年8月26日于韩江中学访谈江美俐校长。

④2013年8月28日于日新独中访谈其英语科主任,Mr. Khoo先生。

族学生在马来西亚生活也必须使用马来语。虽然独中的马来语上课节数不比华语来得多,但有好多独中的学生报考了政府考试,一些学校以双轨制办学,学生也掌握了马来语,因此独中生在马来西亚生活是不会面对问题的。日新独中校长认为,马来语除了是马来西亚的国语,它还是人民之间的沟通语言,可以避免各族间许多误会的发生。身为韩江中学校长兼马来语科主任的江美俐校长认为马来语是我们作为马来西亚子民应该认同的语言,所以学习马来语是学生们不能推卸的责任。它不但是其国民用来和友族团结、沟通的工具,也是华族要了解马来文化的工具<sup>①</sup>。

槟城两所接受访谈的独中校长、教师或学生,他们对于华语、英语和马来语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太大的差异<sup>[12]</sup>。他们都认为华语承载着华人的文化,也是华人的根,华人至少要能听、能讲华语才能达到沟通的目的。一些同学可能认为毕业后不再需要使用华语,但是随着最大汉语使用国——中国的崛起,华语的经济价值也相应提升。如果要让华语继续传承下去,需要学生们珍惜马来西亚所拥有的多元的语言学习环境。一些教师从前因为家庭和环境的因素缺乏接受华语教育的机会,但是他们都坚持学习华语。另一方面,英语是现今主导国际经济和通行世界的语言。学校深信英语可以提升学生毕业后的竞争能力和达致国际化的宏愿。不论在国内或国外,英语是经济语言也是科技语言。掌握了英语对同学来说将会是一项优势,不论是升学或工作方面也让独中毕业生有更多的选择。这项调查发现即使学生们的英语掌握能力不是非常强,但已达到沟通的水平。韩江和日新独中的英语科是三语中拥有最多节数的语文科。这种语言实践反映了认同英语的国际语言的地位以及学生们掌握了英语便在国内或国外拥有优势的意识形态。这两所独中为了加强学生的英语掌握能力,在校内的硬体设施方面建立了英语中心,而且英语科的每周上课节数至少有8节。日新独中的学生每周甚至上10节的英语,韩江则聘请外教来教英语。

通过对其他地区独中的调查<sup>②</sup>,几乎所有独中都采用类似槟城独中所采用的多语教学语政策,但一般上都不是三语并重。这是因为三语并重的

政策并不实际,极可能牺牲不少受困于语言转换和适应的中等资质学生。这项全国性调查发现,华文依然是独中的主要教学媒介语,但由于意识到英文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多数的独中现今都采取强化英文的教学以培养面向国际的毕业生。独中三语兼用的特点成为马来西亚特殊的语言教育现象,这些学校所培养的三语人才也应该成为马来西亚的特殊人才,理应受到政府的重视,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然而,目前政府的语言政策似乎并不重视三语教育,而三语人才也未人尽其才,不能不说是一项巨大的浪费<sup>[13]</sup>。这些人才不被政府重视,但邻国新加坡和国际大企业却视之如宝,大量吸纳独中毕业生进入其国家和公司里服务。有鉴于中国的崛起和其经济发展的前景,国际大公司纷纷进军中国的当儿,马来西亚独中的多语人才正可解决其求才若渴的问题。

## 结 语

作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重要的一环,独中是在华校改制大浪潮冲击下独存的华文中学体系。当时在华教先贤的坚持下,独中拒绝了政府的任何津贴而成为自力更生的民办学校。在20世纪60年代,独中面临学生大量流失而陷入挣扎求存的困境。1973年的独中复兴运动成功扭转了其命运。过后独中虽然一直被国家教育发展边缘化,但历史发展显现了其坚韧的生命力。追溯独中从复兴运动到《独中教育改革纲领》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马来西亚的独中经历了从体制建立到人才培养的过程。在独中教育改革领航下,独中所落实的素质教育和多语教学培养了许多优秀和面向国际的人才,且成为办学的楷模。可惜的是由于独中是民办学校,马来西亚政府一直拒绝承认其文凭,这造成大量华裔人才的流失。一国的语言政策之制定应为国家发展服务,三语兼顾的独中毕业生是不可估量的资源,政府应该正视这项资源,让其在马来西亚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参考文献】

[1] 郑良树.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下转第33页)

①2013年8月26日于韩江中学访谈江美俐校长。

②笔者和研究助理于2013至2014年期间考察了在中马、南马、东马(沙巴和砂拉越)及东海岸的多间独中。

与中国连接起来, 印尼与中国的贸易也逐渐得以发展。印尼一些地方发现的商品遗留物, 充分说明了自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来, 就有许多中国商人前往那里贸易。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中, 印尼华人建构了一种商贸区域网络。这种商贸区域网络形成于 10—15 世纪, 盛行于 16—19 世纪。这种商贸区域网络先以点状分布, 即早期以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巨港等地为支点, 后以苏门答腊的亚齐、爪哇岛的万丹等地为主, 最后发展至以吧达维亚为贸易中心, 连接中国南部沿海的广州、泉州、月港、漳州等港口, 以及巴厘、安汶、廖内、三宝垄、泗水等地。印尼华商来往于吧城与中国的广州、厦门、泉州, 中南半岛的暹罗、马六甲、柔佛等地之间进行区域内和区域外的海洋贸易。

印尼华人的商贸区域网络的开拓与扩展, 不仅加强了印尼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也加强了双方的文化交流。这种商贸区域网络的拓展与扩张, 应该被视为推进印尼国家形成进程中的一个积极的推动因素。

### 【参考文献】

[1] [日]足立六喜著.法显传考证[M].何健民、张小柳译.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4: 56.  
[2] (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M].中华书局.  
[3][13]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M].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8 年版.  
[4] (宋)林之奇.拙斋文集·卷一五·泉州东坡葬番商记[M].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 年影印本.  
[5][14] 福建莆田祥应庙碑记[J].文物参考资料, 1959 (9).  
[6][16][26] (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者婆国[M].中华书局.

[7][18] (明) 宋濂.元史·卷一七·世祖记[M].中华书局.  
[8][20][30] 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378, 171, 362.  
[9] [日]林春胜、林信笃.华夷变态·卷三[M].东洋文库.  
[10] 中华书局编辑部.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三[M].中华书局.  
[11] (清)周凯.厦门志·卷五[M].玉屏书院.  
[12] (宋)朱彧.萍州可谈·卷二[M].台湾商务印书馆.  
[15] (元)脱脱.阿鲁图等.宋史·卷四八九[M].中华书局.  
[17] (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苏吉丹[M].中华书局.  
[19] Dr.Th.Pigcaud. Java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M]. Vol. 11, 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 1960. p18. p98.  
[21] 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校印本.  
[22] 明世宗实录·卷四九六[M].中文出版社.  
[23] (清)张廷玉.明史·卷二三四[M].中华书局.  
[24] (清)汪楫.崇祯长编·卷四一[M].商务印书馆.  
[25] T.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s recorded in the Dagh-Re-gisters of Batavia Castle (those of Hirado and Deshima and other contemporary papers, 1602—1682[M]. Leiden: Brill, 1954. p200.  
[27] [英]坎贝尔.爪哇的过去和现在[A].转引自李长傅.南洋华侨史[M].上海暨南大学海外事业文化部, 1929: 50.  
[28] (清)张廷玉.明史·卷三〇四·三佛齐条[M].中华书局.  
[29] 杨力、叶小敦.东南亚的福建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71.  
[31] [英]W·J·凯特著.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M].王云翔等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8: 12.  
[32][33][34][35][38] [荷]包乐史. [中]吴凤斌. 18 世纪末吧达维亚唐人社会[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45, 47—48, 48, 54, 55.  
[36] [印尼]林天佑.三宝垄的历史[M].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 1984: 38.  
[37] [日]岩成生一.论安汶岛初期的华人街[A].转引自郭瑞明、蒋才培.同安华侨志[M].厦门:鹭江出版社, 1992: 25.

(责任编辑:黄文波)

(上接第 63 页)

(第一分册)[M].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1998: 97.  
[2] Tan Liok E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M].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58.  
[3]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董总 50 年特刊 (1954—2004)[M].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2004.  
[4] 安焕然.坚毅的信念:拒绝改制与宽柔董事[A].安焕然、郑良树.宽柔纪事本末[M].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 2005: 164.  
[5]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四分册)[M].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2003: 166.  
[6]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2007 年华文独中董事交流会资料汇编[Z].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

会, 2008: 28.  
[7]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60 年会庆特刊 (1954—2014)[Z].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2014: 781.  
[8][9] 王国璋.反思独中的教学语政策:本土模式、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模式的比较[A].挑战与革新:2014 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讨会论文集[C].吉隆坡:林连玉基金, 2015: 154.  
[10][11][12][13] 王晓梅、孙招娣、祝家丰.檳城华中中学的语言管理.2014 年第二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双年会论文集[C].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2014: 469—471.

(责任编辑:黄文波)